清史纂修（本栏目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支持）

从沈瑜庆仕宦沉浮看清末政局流变

翁有为　沙金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清朝便退出历史舞台。此种结果是学界持续聚焦的核心议题。笔者拟从官员个体视角以及一个较长时段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受家庭背景和清末时势的影响，沈瑜庆怀有强烈的经世愿望。他从政的二十年间正是清灭亡前的二十年，其政治际遇与清末政局紧密相连。目前学界对沈瑜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某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活动，①尚未对其仕途晋阶诸阶段变化之关系及与时代互动过程探究厘清。

本文运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史料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档案史料、日记和报纸史料，形成多元翔实史料支撑，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意在从历史时代的变动中厘清沈瑜庆各个时段个人际遇、变动的关系，另一方面更试图通过分析他的个人仕途沉浮演化探讨并揭示清末政局的演进底蕴，尤其是晚清统治兴衰治乱及走向最后覆灭的根由，既从特定时代看沈瑜庆仕途进退沉浮的微观生命历程，又从沈瑜庆个案透视清末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文中不当之处，尚请识者指正。

一、甲午战后政局变幻下的挣扎沉浮

沈瑜庆，字爱苍，自号涛园，福建侯官人，生于咸丰八年（1858），卒于民国七年（1918）。其父是沈葆桢，曾任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74年日本犯台时任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开发、经略台湾，为1885年台湾建省奠定基础，是一朝功臣。其外公林则徐历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是一朝名臣。他是典型的显宦世家子弟。这样的家世，他的早期仕途、人生该是如何？

（一）“横流之世”志难酬

沈瑜庆于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时年已27岁，其父沈葆桢已去世6年。沈瑜庆中举后，经三次会试均无果。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以恩荫起步，任刑部广西司行走。光绪十六年，

[收稿日期] 2024-12-08
[作者简介] 翁有为（1963—　），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开封475001，wengyouwei@126.com；沙金泽（1998—　），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开封475001，sjzheun@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20&ZD232）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陈培各:《沈瑜庆与清末贵州政治》，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戴海斌:《“两收海军余烬”：甲午、庚子时期沈瑜庆事迹钩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韩阳:《沈瑜庆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戴鸿飞:《沈瑜庆诗歌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沈在第三次会试落第后，借助其父沈葆桢的人脉，至天津拜谒李鸿章，李以其“少年名干，才器颇佳”推荐于两江总督曾国荃，“蒙委会办江南水师学堂”。①

受沈葆桢影响，沈瑜庆对海军抱有特殊情感：“微臣夙从先臣生长兵间，于海军尤深悉其缔造艰难。”② 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时在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府的沈瑜庆，极力劝说张收留北洋海军残部，张则命上海官员择情收留溃勇以待将来备用，由此北洋海军得以保存。③《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还向翁同龢求助，称“台绅联名函属转恳吾师造膝密陈”，④ 明知无希望而仍盼望挽回一局，表明他对台湾抱持的深厚家国情怀。然大局已定，志愿难酬。

台湾被割让后，沈瑜庆悲愤交加，写下《哀余皇》来记录史事，表达情感。该诗记录了他对清廷爱恨交加的复杂态度。他一方面希望清廷能重新振作，复仇雪耻，诗首句“城濮之兆报在郲，会稽已作姑苏地”和尾句“州来在吴犹在楚，寝苫勿忘告军吏”都寄托了这种期望。另一方面，诗中也表现出其对清廷的不满，如“蓄艾遗言动九重，因以为功宜可嗣。谁知一举罢珠崖，东败造舟无噍类”。⑤ 这两句诗是说他本以为清廷会重视沈葆桢临终上疏清廷力办海军的建议，没想到清廷根本未加重视。

甲午战争激起戊戌变法，变法仅百日就被扼杀，沈瑜庆的女婿林旭因在“六君子”之列而为当局所害。这一结果，对沈造成极大打击，家国不幸的双重打击，使他对政局的态度趋于极度消沉。他给友人的信写道：“自遭大故，翅翎摧塌。”⑥“意绪非复少时。”⑦ 他在与翁同龢的往返信函中诉说：“亲朋变故，公劳私戚，得病几殆。”翁则对沈说“交游遍海内，求始终不渝者，不过三数人，而足下其一也”；并表示自己的处境亦为“欲言而不能言者”。⑧ 沈、翁相互倾诉心曲，相互获得政治上与精神上慰藉。

甲午战后，沈瑜庆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在皖北正阳关办理皖北督销局事务。光绪二十五年，沈瑜庆“由正阳卸差回省，值使者南来，委查办各事，以此招怨。遂至顶补之淮扬道缺，亦不获叙补”。⑨ 仕途似不顺遂。此时，刘坤一又让他经理上海吴淞清丈工程局。沈瑜庆此时情绪难以振作，遂向李鸿章求助，希望其能帮助自己从吴淞清丈工程局脱身，他认为此职位久任“必不讨好，不能不早求摆脱也”。⑩ 而李鸿章则从另一面看问题，认为吴淞清丈局是“新经查办，利弊洞悉，故借熟手，以资整顿”，倒是个磨砺之机，让他不要担心，并希望其“勉尽职业，守己待时，至为企属”。⑪ 沈瑜庆除求李鸿章外，还曾向余诚格求助：“公爱我而知我者，能揄扬而提挈之否耶？”⑫ 可见沈的心境。而正如李鸿章洞察，他最终还是胜任此差。两江总督刘坤一因

---

①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203 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顺天府府尹沈瑜庆，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6188-091。

③ 详细考证见戴海斌：《“两收海军余烬”：甲午、庚子时期沈瑜庆事迹钩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④ 《沈道致京户部翁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 30 册，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688 页。

⑤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18 页。

⑥ 沈瑜庆：《致刘幼丹前辈》，《沈观察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甲 590。

⑦ 沈瑜庆：《致李伯虞前辈》，《沈观察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甲 590。

⑧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19-220 页。

⑨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26-227 页。

⑩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28 页。

⑪ 《复办理吴淞清丈工程各局记名简放江苏尽先即补道沈》，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6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43-244 页。

⑫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27 页。

此向清廷奏保："现在委办吴淞埠务，区画井井有条，华洋莫不翕服。"①

沈瑜庆以世家出身，以干才受张之洞、刘坤一两大员推重，以总办江南水师学堂做起受到重视，却不自觉处于戊戌变法的旋涡之中。其父曾苦心经营的台湾被割让，尤其是其爱婿林旭系戊戌被害六君子之一，不能不影响到他的个人情感及政治态度。他在戊戌政变后的诗中感叹"钩党方屠戮。士气既不伸，国势日以蹙"，② 与严复当时所云"求治翻为罪……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③ 及陈三立所言"国家许大事，长跽难具陈"④ 是相呼应的，显示沈对维新派的同情及对当局倒行的不满与忧虑。他后来亦感叹："时方多故，海有横流，小草出山，终何裨补。"⑤ 其态度是疑虑和悲观的。在那样的政局变幻下，即使世家出身的沈瑜庆，亦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显示清廷的统治内部陷入严重深刻的危机。

（二）庚子变后"欲补天"

戊戌政变后清朝政治氛围渐趋保守，然而庚子事变的爆发，反使政局有峰回路转之机。此前沈瑜庆对清朝和自身命运都持悲观态度，而面对庚子事变带来的危机，沈瑜庆的身世和经历决定他还是"补天派"。他毅然加入到东南互保的行列，事后仕途转为顺畅。

庚子事变爆发后，中国北方陷入战火之中。沈瑜庆利用其人脉资源和通晓洋务优势，在东南互保中，与盛宣怀互相联络，还主动与张之洞、刘坤一联系，他往来于宁沪之间，居中联络，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此外，沈瑜庆再度献策保留了南下的北洋海军。大沽战时，北洋海军南下避战，上海租界视其为战争信号。沈急电刘坤一提出舰队驻扎江阴，战事得免。⑥

庚子事变迫使清政府扭转了渐趋保守的政局。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改革上谕。经此事，盛宣怀就认为，"天下事能如今年保护之局，何不可为"，⑦ 并宣称："只要有今年六七八九月坚定之气，矢以数年，如不改观，惟宣是问。"⑧ 沈瑜庆因戊戌变法案波及其家事，一度怀疑新政只是迫于压力的敷衍之举。他曾给友人说："积弱积弊譬如犹倾之厦……必扫地更张重立间架乃可支也。"⑨ 而在确认新政变法为真后，沈瑜庆在仕途沉浮挣扎中受到鼓舞，看到希望，大有"诏书一夕行万里（本日电传变法谕旨），弊事并洗诸膻腥……收京先草迎銮表，磨崖待勒中兴铭"的气概。⑩ 他认为此次正是再现"中兴"的大好时机。

光绪二十七年，沈瑜庆经由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举荐，叙补淮扬海道。该缺"经管河湖工程，分巡淮、扬、海三府州地方，最为烦剧，并办理各关坝宣蓄关键，在在均关紧要"。⑪ 此缺紧要，地位尊崇，需要精明干练的人才能胜任。

沈瑜庆之后的政治际遇，显示清廷已对他颇为重视。光绪二十九年，沈升为湖南按察使，旋又改为顺天府尹。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淮扬海道与顺天府尹都是极为特殊的官缺，品级虽稍低，但地位尊崇。顺天府尹虽和湖南按察使品级相仿，但这是京官，近在京畿，比外官

---

① 《特保道员备简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 3 册，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202 页。

②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49 页。

③ 严复：《戊戌八月感事》，刘琅主编：《精读严复》，鹭江出版社，2007 年，第 357 页。

④ 马卫中、董俊珏：《陈三立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63 页。

⑤ 沈瑜庆：《致刘幼丹前辈》，《沈观察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甲 590。

⑥ 详细考证见戴海斌：《"两收海军余烬"：甲午、庚子时期沈瑜庆事迹钩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⑦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 4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3 辑，文海出版社，1975 年，第 1102 页。

⑧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 49，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3 辑，第 1118 页。

⑨ 沈瑜庆：《复杨劭蓂大令》，《沈观察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甲 590。

⑩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63 页。

⑪ 《淮扬海道仍请以王加敏补授折》，光绪九年十月二十日，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 8，岳麓书社，2014 年，第 335 页。

尊崇很多。陈宝琛即言：“既补淮扬海道，擢湘臬，未至，即授顺天府尹，骎骎向用矣。”[①] 樊增祥则在赠诗中谓“千载风流说尹京”，不免有恭维之意，亦有“近观江表英雄传，重作幽燕老将行”[②] 的肯定和进一步发展的期待。沈瑜庆入都后在宫门请安时，“孝钦召对，有你在江南官声甚好之褒”，[③] 应该说沈已进入慈禧太后的用人视野，只是刚得重用，还在观察阶段。

二、清末新政局势下的仕途困境

光绪二十九年，沈瑜庆补授顺天府尹。他上任后，求治之心过于强烈，与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产生矛盾，仕途在极短暂的顺畅后，便受到打击，但他依然被慈禧看重。然在袁的排挤下，最终还是被革职去官。这从侧面显示出清末政治生态的日益恶化。

（一）求治心切，与袁有隙

沈瑜庆接任顺天府尹后，恰逢日俄战争爆发，其心态转趋激进。沈认定无论日俄战争结果如何，中国都受其害，必须抓紧练兵自卫。为达此目的，他不惜进行政治冒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泰西有探险家，今乃小试其术，倘风色不顺，即谋转轮。”[④] 随后，他上密折言兵事，“请加征地丁钱粮，专为海陆军之用”。[⑤] 在附片中又提出变革现有军事体制，让“各省自选土著，未经入营之少年”，同时建议“欲去扣饷缺额之弊”必须“分管兵、管饷为两事”。[⑥] 指出只有这样，才能除去军制的弊病。他冒着政治风险谈兵事，并要练兵御外。如此行事，易在仕途上为人所乘。

果然，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沈瑜庆即被外调为山西按察使。他入宫谢恩时，又上奏痛言分兵之害，“甲午之役，北洋海军全失，而各省无赴援者，此皆前事之可鉴戒者。西人讥中国十八省为十八小国，不得谓其为过言也”，主张“时事日急，请联合各省现有海军，亟图扩充，以壮声势而维危局”，[⑦] 希望清廷能不再吝啬资金，赶紧统一海军，加快海军建设。此外，他还提出必须改变陆军“将弁专习应酬奔走，兵则闲游滋事”的恶习，让“有练兵之责者宜于此事时时留意，极力铲除”。[⑧] 沈是为朝廷分忧，明知自己外调，亦再次进言兵事。

考诸史实，沈瑜庆外迁源于同袁世凯的矛盾。他心知屡次“条陈军事，为项城所忌，遂有左迁晋臬之命”。[⑨]《凌霄一士随笔》则载沈、袁相处似不睦，“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分为敌体，然直督位较尊，而世凯督直，声势尤异寻常。历任府尹，恒推让之，瑜庆则不肯相下。”[⑩] 沈本外调山西，旋改调广东按察使。在沈看来，从山西调往广东，也是袁的运作。“去岁弃外以来，忌者之意以晋与粤为近仕途之畏途，故展转遣之。”[⑪] 沈调任粤臬次日，袁即请增顺天府尹养廉银，“顺天府府尹一缺，治临首善”，“政务极为繁赜”，且“府尹系正三品京堂，与外官按察使品级

---

① 陈宝琛：《沈涛园中丞六十双寿序》，丁巳（1917），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

②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237页。

③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237页。

④ 沈瑜庆：《复张彝之观察》，《沈观察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甲590。

⑤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238页。

⑥《军机处录副奏片》，顺天府府尹沈瑜庆，光绪三十一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37-003。

⑦《军机处录副奏折》，顺天府府尹沈瑜庆，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6188-091。

⑧《沈瑜庆条奏军政及钱政》，《时报》1905年3月16日第6版。

⑨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249页。

⑩ 徐凌霄、徐一士著，刘悦斌、韩策校订：《凌霄一士随笔》上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468页。

⑪《沈瑜庆禀张曾敭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96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566页。

虽等，体制较崇”，又现顺天府尹责任比从前更重，“用款之增，亦较从前数倍”。① 袁此举耐人寻味，意当在打击沈。突然外迁，必令沈瑜庆深为失落。如《郑孝胥日记》载：“得北京电，云：‘公不得归，我亦弃外……爱，江。’”② 爱即沈瑜庆。

慈禧命沈瑜庆“抵粤后与岑督商议整顿海军办理防务”，沈则另请求“严守闽省船厂，以防俄舰侵犯”。慈禧采纳了他的建议，“电饬福州将军崇善遵办”。③ 这亦表明慈禧仍在信任他。沈到广东任按察使，两广总督岑春煊虽绰号“官屠”，对下属极为严苛，但两人“遇事多往返咨度，无不恕其戆拙”，④ 对沈颇器重。在粤一年时间，沈便升任江西布政使，表明沈的外迁，即使有袁世凯刻意打击成分，亦非朝廷本意，其并未被“弃外”。

沈瑜庆熟悉海军，对军事多有见地，甚至想从制度入手彻底改变清廷军事弊政。这些设计，未免太过超前，而袁世凯此时正深得清廷器重练兵，沈意在介入军事，必为袁世凯不能容忍。

（二）政见分歧终被袁派排挤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沈瑜庆升江西布政使。在江西时，沈先与两江总督端方交恶，后冯汝骙接替江西巡抚瑞良后，沈又与冯针锋相对，继而不自觉被卷入丁未政潮，最终为袁所不容，遭罢官。

1. 与袁阵营端方交恶

与袁世凯有姻亲且有政治同盟关系的端方，时任两江总督，沈瑜庆为江西布政使，为端属下。按常理讲，二者不会有太大矛盾，然二者之间矛盾不断，端欲除之而后快。

端、沈二人之间的矛盾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时任江西巡抚瑞良则是焦点。种种巧合，让端方最终认定沈瑜庆为岑春煊死党，二者矛盾激化到极点。瑞良，字鼎臣，正黄旗。沈瑜庆认为他“魄力稍差”，⑤ 端方认为“此君在赣，事事假手，于人形同傀儡”，⑥ 可见瑞良缺乏决断力。

清末滥铸铜元导致银价日涨，江西财政困难。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瑞良奏请恢复州县征收丁漕旧章来缓解困难，清廷回“明春察看地方情形，再行奏明办理”。⑦ 之后，瑞良为了筹措巡防队薪饷又提出将“月协两江督标、漕标八千两全数截留”，清廷则让瑞良与端方对新湘营协饷问题“妥商办理”。⑧ 结果，“端四爷因争新湘营协饷，怒鼎帅波及鄙人，亦以此为口实，面属俞恪士考察，行将以微罪行”。⑨ 端方认为沈为瑞良出谋划策，始迁怒之。

八月，江西南康、赣州等地发生教案。教案发生后，端方极力主张由新任江西按察使瑞澂在上海处理，瑞澂有政声，为端所欣赏，并为其“谋赣抚”。⑩ 沈瑜庆则认为“若听其派兵赴赣，提案在沪议结，则所费必在百万之外”。⑪ 于是，他极力劝说瑞良“据实上陈”，并“密请南皮主持”。⑫ 在其努力下，端方、瑞澂二人未能如愿。“据瑞良电奏，南康匪乱，镇慑缉拿，该省兵力，

---

① 《请增顺天府尹养廉银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3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01–402 页。

②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2 册，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中华书局，1993 年，第 981 页。

③ 《电报一》，《时报》1905 年 5 月 14 日第 3 版。

④ 《沈瑜庆禀张曾敭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 96 册，第 566 页。

⑤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79 页。

⑥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七日），端方档案，档案号：27-01-001-000164-0059，转引自张建斌：《丁未政潮余波：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因应》，《史学月刊》2023 年第 7 期。

⑦ 《清德宗实录》卷 574，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庚戌。

⑧ 《度支部陆军部议覆江西巡抚瑞奏陈编改营制饷章并请截留协饷折》，《东方杂志》第 5 卷第 1 期。

⑨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71 页。端四爷即端方，鼎帅即瑞良。

⑩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88 页。瑞澂，琦善之孙，前期虚名居多，从实际看，能力有限。

⑪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78–279 页。

⑫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74 页。

尚能敷用”，清廷“著端方会商瑞良，酌量妥办”。[1] 由于沈瑜庆“左袒瑞，谢绝其援赣之师”，端方益“大怒，奇孙亦逢人便说”。[2] 另，沈瑜庆护理江西巡抚期间，端方曾“以振务为名，欲提赣藩及关粮库款”，沈“据例驳之”。[3]

依上述，端、沈二人之间可谓积怨已多，而瑞良受端方排挤，“忧劳太过，大有不安其位之意”。[4]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清廷允准“以亲病未痊，准江西巡抚瑞良开缺，留京当差”。[5] 瑞良回京后，给予反击，参劾端方。由于沈与岑春煊关系密切，且岑发动丁未政潮前夕，由上海乘坐海容舰启程，三月初十日，在江西九江接见沈瑜庆等官员后便乘山轿前往庐山游览，并在“庐山之牯牛岭小住一宵”。[6] 这让端方误以为此事背后必有沈瑜庆和岑春煊指使。端方与岑春煊之间曾因争两江总督一职已生裂隙，这时矛盾中又加一层矛盾。于是他捏造事实指使御史陈庆桂参奏沈瑜庆。陈随后上奏，参劾沈瑜庆“结党营私，劣迹昭著”，称其赌博且以此广招贿赂。[7] 清廷派端方彻查，由于此事就是其捏造，端亦只能回奏“查无实据”。[8] 最后清廷还是给沈瑜庆降一级留任，但准其抵销处分。[9] 此事对沈瑜庆打击极大，他给友人诉说：“但问在赣官绅之中，有一人曾与鄙人同局过，即对不住先人，对不住良友，并对不住举主梁节庵”。[10] 张之洞听闻此事，“甚为不平”。[11] 沈与端矛盾，势必牵连与袁派矛盾。

2. 与袁派冯汝骙龃龉致抚藩交讧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清廷命冯汝骙调任江西巡抚。九月，沈瑜庆被开缺，“江西布政使沈瑜庆著开缺另候简用”。[12] 由于太过突然，江西绅民“兹闻开缺，群情失望，莫知所云”。[13]《涛园集》记载沈瑜庆被开缺在于：“冯抚欲援南北洋例提库款办贡品，公守正不阿，抚军不能夺。抚军固党于项城者，未几，遂有开缺来京另简之命。”[14] 时论记载，冯、沈矛盾有二。第一是冯汝骙刚到任，就将沈瑜庆在藩司任内为洋务局建造的精美房舍改作其小妾居住之地，还将谘议局所在的精美房舍用来招待外国领事，沈瑜庆认为“谘议局不宜接待外宾”，外宾“应仍住洋务局”。第二就是冯汝骙要“提库银一万两自办万寿贡礼，又要藩司设法融消”,[15] 在沈的阻挠下，冯未能如愿。《神州日报》报道二人冲突原因也与此一致。[16]《东方杂志》也有类似记载。[17] 多方材料一致，说明其并非空穴来风。

《凌霄一士随笔》对二人矛盾记述颇详。沈对冯刚就任就挪用藩司库款办贡品的做法，加以阻止，冯则“与瑜庆龃龉矣”；冯的旧友汉口日本领事高桥来访，“先以电报通知，汝骙命洋务

---

① 《清德宗实录》卷 580，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甲辰。
②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88 页。奇孙即瑞澂。
③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363 页。
④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67 页。
⑤ 《清德宗实录》卷 587，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乙酉。
⑥ 《岑督纪程》,《时报》1907 年 4 月 27 日第 5 版。
⑦ 《给事中陈庆桂奏江西布政使沈瑜庆结党营私劣迹昭著折》,《盛京时报》1908 年 7 月 26 日第 3 版。
⑧ 详细考证见张建斌：《丁未政潮余波：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因应》,《史学月刊》2023 年第 7 期。
⑨ 《吏部奏遵议赣藩沈瑜庆处分折》,《政治官报》1908 年第 296 期。
⑩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71 页。
⑪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2 册，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第 1139 页。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34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92 页。
⑬ 江西全省绅民：《为恳钧裁藩司沈瑜庆开缺群情失望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 32 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78 页。
⑭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90 页。
⑮ 《赣省抚藩大龃龉之详情》,《汉口中西报》1908 年 10 月 24 日第 4 版。
⑯ 《赣省抚藩之大龃龉》,《神州日报》1908 年 10 月 18 日第 3 版。
⑰ 《宪政篇》,《东方杂志》第 5 卷第 10 期。

局提调某，转告瑜庆”，沈告知洋务局坐办汪钟霖，汪“谓按之本局章程，外人因公而来者，方可延寓局中，若仅以私交，不得援例，因检章程相示。瑜庆即持以告汝骙，谓例所不许，未便通融也。汝骙无以难，而意滋不怿”。冯以退为进致电袁世凯，“世凯知其以去就争易藩司，力为主持，乃令瑜庆开缺”。[①] 综上，冯汝骙公私不分，沈瑜庆依例而行不肯迁就，二者矛盾必然不断加深，冯便设法除去沈瑜庆。在时论看来，沈、冯二人矛盾不断，又因冯为袁党，所以沈被开缺，但事实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沈瑜庆在给盛宣怀的信中透露：“项城排斥异己，并非于我有积怨者，详询罪状，则去夏庐山一游为大影响耳”。[②] 此处提到的“庐山一游”，即是前文所提岑春煊入都发动丁未政潮前夕之事。岑春煊发动的丁未政潮，以倒袁北洋派为目标，清流派初期得手，但袁派运用阴谋、金钱贿赂等非常规手段进行反制，最后政潮以失败告终。沈被袁排挤去官的实际根源，在于丁未政潮。沈在江西的作为以及此前与袁的矛盾，让袁彻底将他划为“岑党”。

大体属于清流一系的沈瑜庆，虽官升至顺天府尹，但地位未固，却与依靠北洋练军至此养成势力的袁世凯在机制上“分为敌体”。[③] 沈自幼熟悉海军，对军事颇有心得，慈禧又对其逐渐看重，这让袁颇为忌惮，于是遭排挤，由京外放，而在粤时与袁颇有嫌隙的两广总督岑春煊相交集，至赣因公复与袁派两江总督端方及冯汝骙有隙。[④] 丁未政潮后，沈虽然处于政潮边缘，但面临处境更窘，已乏外援，沈不得不走到被“开缺”免职的结局。至此，北洋派排斥异己的私争，表明政治生态更为恶化，袁派势力已遍布各处，沈无法绕开，如不与袁派同流合污，就不可有正常的仕途上升空间。沈实际上已陷入严重的仕途内耗困境。

三、宣统政权大厦将倾之下留去均属艰难

光宣政局转易，袁世凯失去权力，沈瑜庆在被开缺后又得以外任贵州布政使，后又升贵州巡抚。只是清廷此时已行将崩塌。

（一）财政困难，求去不得

宣统元年（1909）冬，沈瑜庆出任贵州布政使。传言是某邸游说载沣，说沈瑜庆“才堪大用，颇胜督抚之任，并声续前在江西任内被参实系冤抑”。[⑤] 载沣因此同意沈外任贵州布政使。临行前，载沣还告诫沈瑜庆：“现查黔省吏治不振，财政素乱，到任后务必认真整顿，凡于用人理财，尤宜加意慎重，勿负朝廷倚任。”[⑥]

沈瑜庆此时依然想进入或留在政治中心，以求影响大局，他并不想出任边地，“弟黔中之行，大非所愿，而不能不就道”，“如有机缘，彼此想法摆脱”。[⑦] 但他深知此次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将此次外任作为转圜的契机，再加上好友陈宝琛的劝说，他才决定前去上任，“黔藩命下，君不欲行，宝琛勖以世臣之义，乃行”。[⑧]

沈瑜庆在赴任途中记录了沿途的社会情况。他所过之处一片凋敝景象，社会极不安定。宣统元年冬，沈瑜庆在京请训后乘车至上海，又从上海轻装简行至武昌，由武昌乘船于十二月初

---

① 徐凌霄、徐一士著，刘悦斌、韩策校订：《凌霄一士随笔》上册，第 467 页。

② 《沈瑜庆致盛宣怀函》（13），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中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1404 页。

③ 徐凌霄、徐一士著，刘悦斌、韩策校订：《凌霄一士随笔》上册，第 468 页。

④ 参见江春霖：《梅阳江侍御奏议》卷 2，出版者不详，出版年不详，第 12 页。

⑤ 《沈瑜庆简放之原因》，《汉口中西报》1909 年 11 月 8 日第 4 版。

⑥ 《面谕沈方伯述闻》，《大公报（天津版）》1909 年 11 月 4 日第 2 版。

⑦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294 页。

⑧ 陈宝琛：《沈涛园中丞六十双寿序》，丁巳（1917），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册，第 334 页。

六日至湖南常德登陆，由此陆行入黔。十三日日记载：“是日经行，除离站十余里之扫箕坳一集颇热闹外，余皆萧索，居户亦无多。”十四日，沈瑜庆从辰溪来到沅陵的山塘驿，一路走来沿途萧索，到山塘驿，发现“驿破屋坏，不蔽风雨”，他记道：“好在天晴亦无风，不然苦矣。”① 十八日，沈瑜庆来到便水站，发现驿站不但“欹斜湫隘”，而且“椅棹亦不全”。② 沈瑜庆沿途还几次遇到匪案，有的土匪“报有百余人，均手持快枪”。③ 国家驿站衰败若此，驿道险状若此，已是一幅末世图象。

随着清廷不断推行新政，其财政危机逐渐加深，沈瑜庆在江西时其危机早已显现，而此时贵州财政到了竭蹶地步。宣统二年，贵州因推行禁烟导致“民间一年骤失千余万，官短三十余万”。④ 从长远来说，清廷禁烟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这在当时却导致官民皆伤，还极大激化了官民矛盾，以致风潮迭起，毁署杀官的事件时有发生。沈瑜庆在复度支部电中指出，宣统三年贵州财政年度缺口至少在“一百二三十万”。⑤ 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缺口，沈瑜庆将解救贵州财政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盐厘上。四川每年名义上用盐协济贵州，但实际上贵州官民大受川盐高价之苦，原因就在于四川商贾暗自抬价，贵州官员由于权操他手对此行为无可奈何。为此沈瑜庆想要从此处入手，但这牵扯到四川省的利益。沈瑜庆先向度支部右侍郎陈邦瑞致信，希望他能将此事向载泽代奏，事情无果后，沈瑜庆行文度支部尚书载泽，希望其能为黔省发声，但度支部“来文属自行函商蜀督”。⑥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面对贵州无米为炊的现状，沈瑜庆多方求助以求离黔。宣统二年九月在给友人时任都察院给事中陈田的信中表示：“弟承乏珂乡，将届一年，民事吏事，一无裨补，尸素滋媿，贱躯亦不服水土，明春或可引退矣。”⑦ 十一月，在给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中，沈瑜庆对政局表现出绝望之情：“瑜庆自隶麾下，行将尽年。秉公坚忍之训，就事论事。屻帅推诚，寮友亦幸能相谅。款项虽属支绌，腾挪尚能应手。今年敷衍过矣，明年不可问也。”⑧

新政局势，已如言官陈善同直言：“近年法令繁滋，内外臣工假新政之名以济其贪诈，横酷之私专为朝廷敛怨。”⑨ 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亦痛陈：“袭东西政治之皮毛，易中国礼法之维系，闾阎凋敝极矣，揭竿斩木，岂尽民之无良？诚恐将来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一旦兵生肘腋，患在腹心。”⑩ 陈善同、陈夔龙作为清廷接近中枢的近臣和封疆大员，对清廷面临的严重危机认识是清醒的。沈瑜庆此时对政局亦有清醒认识，他的“明年不可问也”的喟叹，实饱含有深深的忧虑。沈的任职，日益艰难而充满风险。

（二）事功未见而清已亡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廷内阁发布上谕：“庞鸿书著开缺另候简用，贵州巡抚著沈瑜庆补授。”⑪ 沈瑜庆上任后，仍在试图扭转乾坤。尽管宣统三年暴风骤雨已到，他从辛亥四月任巡抚到八月武昌起义爆发的4个月时间里，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官网检索，他以贵州巡抚所上

①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299页。
②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02页。
③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09页。
④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12页。
⑤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23页。
⑥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24页。
⑦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25页。
⑧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26页。
⑨ 《奏请实力修省折》，陈善同：《陈侍御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348页。
⑩ 《筹备立宪预防流弊折》，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二日，陈夔龙著，李立朴等点校：《陈夔龙全集》下册，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282页。
⑪ 《谕旨》，《政治官报》1911年第1277期。

奏折即达 73 份，他甚至在武昌起义前夕提出用征兵制取代募兵制以维护长治久安的策略。① 只是在清末财政亏空、基层统治正在瓦解的情况下，征兵制已不具备实行的条件，而且大厦将倾，已没有时间再等待他去实验了。

这时，保路运动席卷而来。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② 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并最终演变成民众武装起义。七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命他迅速调集军队赴川支援，沈瑜庆回电：“现已酌派征军营管带董福开，拨带得力枪队千人，克日开赴重庆……黔中饷绌兵单，艰窘万状，此次援师出境，势不得已；惟望朝廷威德所被，□格顽愚，则邻疆同受其福。”③ 此时的沈瑜庆似乎已经有所预感，所以将希望寄托在了“朝廷威德”之上。他虽然对时局趋向悲观，但动作迅速，在接到清廷谕旨后便火速派兵增援。云南和陕西接到命令后，云南则“奏赴援须四十日”，陕西“竟推无兵”。由此可以看出沈瑜庆对清王朝有着超乎他人的感情，连载沣都“深为赞许”。④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在贵州的沈瑜庆得知此消息后，积极布置，想要拯救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对于武昌失守，他“屡电请严办失守之大员，并责成海军提督助守汉阳，规复武昌”。⑤ 贵州由于自治学社与宪政会及地方官绅的矛盾激化，促使自治学社很快左倾，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贵州自治学社首领张百麟等准备发动起义，他们积极联络军界、学界、警界、巡抚卫队及哥老会等，密谋起义。而沈瑜庆则联合宪政会，意在阻止贵州发生革命。他“借练打靶消耗其原领子弹”,⑥ 以此来防止新军暴动。他还听取宪政会士绅的建议，电商云贵总督李经羲，让靖边营管带刘显世，“俾募土著五百人，星夜来省，以资捍卫。又令郭重光呈办城防，立保安军一营，归城防局指挥”。⑦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自治学社与宪政会达成一致，决定向沈瑜庆要求和平独立，沈则坚决不允。之后，“郭重光私谒瑜庆，献自保之策，取半独立的形式，公用人、行政之权于大众。瑜庆立可”。其实沈瑜庆是以此拖延时间等待刘显世，“待刘显世兵集，按册诛自治党人”。⑧

然而，11 月 3 日，贵州新军起义，他最后欲依靠巡抚卫队做最后一搏，没想到巡抚卫队回答：“沈帅本身，我等誓死保全。若杀党人，决难以应命。”⑨ 沈瑜庆见时局如此，知道大势已去，只好放弃了抵抗，交出巡抚印信。人们推举沈瑜庆为民军都督，沈坚决拒绝。他的下属陈星庚回忆：“午后便服进抚署，至则见沈抚在客室，横卧藤椅，自言将死，皇上付我封疆，以至不守，何以对国！又怫然曰，坐而待毙，不如起而对垒。而财政监理官彭谷孙，巡警道贺国昌，新军标统袁义保，候补道姜思治（陆军小学监督）等立劝以大势已去，非偏隅黔省所能挽回，不如归去，遂我初服”。⑩ 在革命大势压力下，沈和平交出政权。这对沈瑜庆而言，亦是不得不做出的艰难抉择。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贵州巡抚沈瑜庆，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480-074。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37 册，第 92-93 页。

③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370 页。

④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 365 页。

⑤ 沈瑜庆：《涛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336-337 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第 149 页。

⑦ 周素园：《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88 页。

⑧ 周素园：《周素园文集》，第 272 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 149 页。

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82 页。

四、结语

沈瑜庆仕途沉浮的个案，演绎了鲜明独特的个人微观史和清末时代的风云大历史。沈虽非那个时代政权核心圈的重要人物，但一直与核心圈多有交集，官至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抚，亦非平庸等闲之辈，以其特殊的身份、行事、操守与个性，在不同程度上分别涉入戊戌变法、庚子东南互保、丁未政潮及辛亥鼎革之变四大历史事件，这在那个时代的官场经历中为数并不多见，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他在甲午战后政局变幻下的挣扎与沉浮，他在清末新政局势下的仕途困境，他在清廷大厦将倾之下的留去均属艰难，一方面体现了沈瑜庆个人在那个政局变幻莫测、政治生态愈来愈险恶的历史时期的家庭变故、仕途顺逆起伏及官场恩怨下的选择与无奈，另一方面亦透视了清廷统治集团陷于内部不断的矛盾倾轧，在名为新政实为敷衍的过场中油尽灯干。

正如清末侍读学士恽毓鼎所说："盖世家累代贵仕，与国家情谊联属，休戚相关，君臣之际有一段亲切诚挚之意。"[①] 这句话精准地解释了沈瑜庆的行为。沈出身世家，对中国海军极为熟悉，他也将经世救国作为自身理想。随着时局演进，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激化到极点。在这期间，他反抗、坚持，但最终无能为力。刘坤一曾评价他："赋性强毅，卓著丰裁。有明决之资，经权悉协；有贞固之力，终始不渝。历试皆然。"[②] 可谓有识人之明。最终，历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沈只能在民国成立数年后，无奈地在矛盾中死去。

沈瑜庆的命运根源在于清末时局。甲午战争是清末政局诡幻的开始，其打破了清朝此前似可苟安的政局。从这之后，帝后之争愈演愈烈，而中外矛盾激化与中枢无能酿成了庚子事变。清廷虽然得以暂时保全，且痛定思痛宣布新政，但东南互保亦引起清廷的不安，乃借新政之名大力推行中央集权，袁世凯则借势发展党羽，搅乱政治生态。这就使得清朝内部新旧矛盾、清浊矛盾、央地矛盾、省际矛盾、官民矛盾越来越严重，围绕权力和利益的激烈争夺与内耗越来越致命，财政竭蹶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光宣政局转换后，此种态势依然未能扭转反而加剧。在下者财政匮竭导致无事可做，在上者只顾争夺权力与利益，革命只是最后一击，其"土崩瓦解之一日"[③] 已为疆臣锡良所言中。就此而言，沈瑜庆的政治史，既具有个案特殊性，又具有时代典型性，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清末治乱兴衰的独特标本，值得进一步发掘与深入探究。

---

①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1 册，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三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51 页。

② 《特保道员备简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 3 册，第 1202 页。

③ 《时局危急密陈管见折》，宣统二年三月十七日，锡良：《锡清弼制军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1 辑，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 1126 页。